

开显意识形态的革命意蕴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卢德友

内容提要 基于真切领悟特殊的时代条件与历史境遇,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理论内容和风格。以意识形态作为主要解释定向,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高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突破了市民社会的经典诠释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由葛兰西发起的转轨,开出了文化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思想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葛兰西 市民社会 意识形态 文化领导权

卢德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430072

当前学界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大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演变过程为叙述背景,藉此探讨其得失成败,且褒扬与批判并存。而深入于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本身,追究其理解的独特性及合理性,却鲜有更具针对性的阐说。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厘清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与众不同之处及其成因,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合理地把握葛兰西的思想原像,从而获得真正具有启发性价值的思想因素。据此,本文将致力于探讨如下问题:葛兰西缘何对市民社会采取独特的理解?这种理解在思想史中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当今时代的社会建设可以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

一、市民社会理解中的独特面孔

总体上看,人类围绕市民社会而构建的知识图

像,大致有两大阐释路向:一是从城邦和政治社会出发来描述市民社会,一是由私有财产和物质交往来厘定市民社会的基本含义。高擎意识形态和文化大旗的葛兰西,毕生皆投身于革命的实践。这样的生活境遇,直接影响到葛兰西理论活动的一般走向,以至于葛兰西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解,呈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深厚的革命底蕴,成为游离于两大主流认识的别致景观。

葛兰西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一个阶级只有取得文化领导权才能上升为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是获得和维持政权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凭借强力统治社会的政治国家将缺乏合法性和持久性,反之拥有市民社会领导权的政治国家却根基稳固,因此国家必须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所谓拥有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正是通过建立文化领导权来实现的。一个阶级要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三线逻辑行进研究”(项目编号:2010113010200041)阶段性成果,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兼论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09BZX007)。

想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无疑需要经过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就要求这个阶级能够处理好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形成承认其领导地位的联盟。在这种“为承认而斗争”中,这个阶级通过价值建构、思想引领、文化渲染等形式,在市民社会中形成认同或共识,进而获得真正的文化领导权。那么,究竟由谁来实施这种文化渗透而操纵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呢?葛兰西认为,唯有社会中的“有机知识分子”才能担当如此之重任。

葛兰西市民社会的理论出发点是“有机知识分子”。正是从探讨社会有机知识分子出发,葛兰西才指出夺取市民社会中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狱中札记》是葛兰西系统阐发其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著作,开篇就讨论意大利知识分子问题。此举的用意,就在于通过探索知识分子集团的社会基础、出身背景,凸显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从而探究市民社会的历史流变及其发展为目前状态的机理。这番历史考察,葛兰西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1)知识分子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力量。知识分子被纳入国家体制并充当所处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传播的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像一张巧妙的蛛网将工人紧紧缠绕住。不消说,知识分子是政治国家之外的统治力量,也间接持有统治权力。“知识分子便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1](2)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使他们成为“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指“具有组织整个社会,包括所有复杂的服务机构以至于政府机构的能力”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自愿认同统治阶级,并以其代理人的身份行使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是因为决定于统治阶级的经济状况。知识分子往往依附于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都要从自己阶级内部培养或从外部吸纳有机知识分子。(3)有机知识分子是夺取领导权的文化力量。葛兰西分析道:“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初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2]所以,资产阶级需要依靠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来灌输意识形态,发挥文化的传播与渗透功能,让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对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制度产生积极认同。而被统治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也需要依靠自己的有机知识

分子去感染其他社会成员,进而认同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这三个结论支撑了一个基本观点:赢得领导权要比实现专政统治更重要。正是这样,葛兰西非常看重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领导权问题。

市民社会领导权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上层建筑已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保护屏障。这种起保护作用的上层建筑以两副面孔表现出来,正如葛兰西所指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是‘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3]在葛兰西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已变成“完整国家”,即传统意义的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被整合为一体,市民社会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完整国家”并不单纯是一个强制机器,而且还“构成一个社会集团统治其他人口(或市民社会)的领导机构:狭义的政府强制机构的国家基础。”^[4]最后,他得出一个著名的公式:“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5]当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逐步壮大而覆盖到全社会时,政治上的统治权就无存在的必要,国家即宣告消亡。如此说来,葛兰西所描绘或向往的市民社会,大致定格在独立于政治活动的特定领域,即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关、文化学术团体、工会、政党等。

那么,无产阶级究竟如何才能获得社会的领导权呢?葛兰西提出两个关键性的措施。第一,构筑自己的壕沟或阵地,亦即在市民社会中组建本阶级的舆论机构和社会团体,以便获得得以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的牢固平台。第二,立足这些平台发动“阵地战”,以本阶级的思想文化摧毁并取代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价值体系,在“精神和道德改革”进程中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在葛兰西眼里,革命环境的时空差异,决定了革命斗争的具体策略,无产阶级不应固守教条。在俄国等东方国家,市民社会始终处于孱弱或者根本缺失的状态,无力成为国家政权的内部支撑,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直接对刚性国家展开正面武装交锋,以“运动战”的形式迅速夺得政权。而在葛兰西身处的西方社会,矗立在国家政权背后的,是强大的、由资产阶级牢牢掌握领导权的市民社会上层建筑——国家政权最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这种情况下,正面攻击国家政权往往会遭遇失败的惨淡结局。据此,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抢占市民社会领导权这个关键阵地,尔后通过长期开展“阵地战”,以取代资产阶级而行使社会

的领导权。在“阵地战”策略中,无产阶级正面攻击目标转向了市民社会。政党、工会、教会乃至报刊、学校等市民社会组织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阵地,资产阶级无疑也要努力抢占这些文化阵地。无产阶级必须尽最大力量利用这些文化阵地,扩大自身的影响,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使社会民众认同和接受本阶级的文化价值理念,战胜并取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最终赢得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以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挤占国家政治统治权时,国家就会在不断萎缩中消失自己存在的根基,成为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概括地说,从城邦政治到市民精神、从社会契约到天赋权利、从私有财产到“交往活动”,市民社会理论在思想史上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承载着当时所处时代的历史使命。葛兰西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解,强调意识形态、重视文化因素、激发无产阶级阶级意志,彰显出特殊的理论气质,实质上正是一个思想者洞悉时代变迁或转型的思想迸发。

二、思想洞见的深层缘由

如果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那么,在众多相关研究竞相粉墨登场而形成的思想合唱中,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可谓独成一曲。这是葛兰西的偶发奇想吗?不是。众所周知,每位思想家都是自觉不自觉地立足于自己的时代进行思考,每一种理论都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葛兰西也概莫能外。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境遇开启并推动了葛兰西的理论思考?换言之,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反映了怎样的时代处境?这样说来,我们决定性地要把视线聚焦于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基本事实,是葛兰西生活于其中且须臾不能摆脱的时代境况。

葛兰西所遭遇到的现代性生存状态,是更为深入和成熟的现代性生活。其突出表现,就是生产过程的理性计算化操纵、组织管理方式的科层制、人的主体性消沉,以及贯穿整个现代生活的资本统治。它们又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等积极因素混杂并存,一起绘制出现代性的多副“面孔”。为了开出诊治现代性疾病的良方,葛兰西以张扬人的主体性来唤起日渐颓废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实属面临现代性强大攻势而做出的无奈之举。

首先,由于现代性过程中工具理性对于价值理性的僭越和褫夺,人被绑定在现代生产的“泰罗制”

之中,绑定在忙碌不停的机械操作之中,仅仅获得了能够在现代社会生存下来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对于科学技术有着天然的尊崇和依赖,技术理性便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独步于日常生活中新的形而上学。卢卡奇对此也有颇有同感,并道破了要害:“合理机械化的和可算计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6]其次,与经济生活中理性算计相交织的,是矗立在社会管理网络中的“科层制”——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纯粹技术上的理性完善,将专业分工发挥到极致,目的是要达到最高的管理或统治效率。科层制在现代社会运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曾获得这样不菲的评价:“在当今社会,科层制已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并在事实上成了现代性的缩影。”^[7]经济生产“泰罗制”和社会管理“科层制”的双重渗透和挤压,抑制了人的主体性及其意识。这成为葛兰西试图力创独特的市民社会理论、以激发无产阶级意识的深层因由。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了低潮,革命意志一度处于衰弱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要想掌握“政治社会”领导权,先决条件当然是要能够控制市民社会,而重中之重无疑就是要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争夺文化领导权。既然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已然凸显,葛兰西遂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在于夺取市民社会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霸权”,进而才能张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对资产阶级展开“阵地战”。

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展示了强大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国家据此采取了更加隐蔽、更为间接且更富成效的统治手段。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具体说来,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推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用资产阶级意识占领整个政治生活,并日益渗透到私人生活空间。在如此这般文化氛围的笼罩下,很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逐渐被整合进资产阶级国家结构之中,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和革命意识隐而不彰地逐步消退,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尤为严重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实践中做出了教条化和庸俗化的执行和回应,这就加重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所遭遇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第二国际的思想家无以有效应对。而第三国际不但没有在理论上做出

反击,反而满足于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辩护,使得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一度陷入僵局。

阶级意识如何能够激发而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一致从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他们尝试用总体性理论来分析市民社会,青年卢卡奇、柯尔施等认为要把社会与个人的联系当作是一个关联的总体,柯尔施的努力更是表现为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用总体性原则看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保持个人自由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8]这种个人与社会、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之间的联系,恰恰是市民社会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葛兰西则明确反对第二国际内部以考茨基等人为首的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忽视了革命过程中的意志因素,由此才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革命意蕴生发出来。在当时业已乔装改扮的资本主义统治下,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基于反思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针对第二国际以及布哈林等人机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理论的错误,特别是要纠正他们对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的简单化教条化的理解。而且,葛兰西的理论研究,还是他试图为西欧无产阶级寻求一条不同于苏俄革命道路的一种理论尝试。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肯认的,“以正义的良心和主观的阶级意志重新唤醒物化了的无产阶级,这正是青年卢卡奇、葛兰西全部哲学思想的内在意向。”^[9]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守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意图,即便比较隐蔽,但仍是路人皆知。后来出现的众多社会批判理论,诸如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马尔库塞令人信服地针砭的“单向度的人”,等等,皆不约而同地指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个领域。此外,虽然在意识形态和科学问题上阿尔都塞曾对葛兰西大加责难,但在反对经济主义方面,阿尔都塞却是和葛兰西一致的。他们都认同,不应仅仅从经济决定政治这样一个单一的机械决定论层面来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由此去认识人类历史。我们要想完整理解历史的基础,就必须对历史本身有一个总体认识或把握。此外,葛兰西还批判了第二国际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错误倾向,认为他们忽视哲学、心理学、文化和思想意识的作用,片面强调经济因素而弱化阶级意志。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实践哲学”,目的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为无产阶级建构阶级意志以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由此看来,基于深切领悟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和实际影响,以及无产阶级的思想状态和革命情势,葛兰西明确无误地从意识形态视角阐释市民社会,旨在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真正切入社会生活之中,获得社会的领导权。葛兰西的这些构思和理解,可谓匠心独运,充满了创造性。正是这种从现实生活需要出发的理论独创,扩大了市民社会的概念边界,拓宽了理论研究视野,开启了新的思考方向,为当今的市民社会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

三、继往开来的理论界标

还原到思想史的原发语境,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引起了颇多的争议。这不仅因为其理论内容或风格迥异于传统的认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葛兰西与马克思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是相反。然而,无论我们给予它何种评说,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上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下启当代市民社会研究的思想风潮,就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言,可谓在思想史博弈中始终处于在场状态。这不是偶然的。

在市民社会问题上,葛兰西最推崇的理论前辈恐怕当属黑格尔。透过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中的经济因素,葛兰西接续了市民社会作为伦理精神的那种抽象普遍性。我们看到,17、18世纪英法等国的自然法、契约论的那些思想家,一般都在“国家”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直到亚当·弗格森在《市民社会史》中,才将“市民社会”阐释和论证为纯粹的社会概念。黑格尔在摆脱“市民社会”概念纯粹社会学含义的基础上,赋予其诸多新的意涵。他认为,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10]。这种联合,通过“需要”、“法律制度”和“外部秩序”而具体建立起来。依循黑格尔的逻辑,把独立自存的和互不相干的个体事物总括起来的联结,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联系,我们由此只能获得一种抽象的和形式上的普遍性。黑格尔曾指出:“如果把国家想象为各个不同的人的统一,亦即仅仅是共同性的统一,其所想象的只是指市民社会的规定而言。”^[11]正是循着这一路径,葛兰西没有从经济关系和需要体系来阐释市民社会,而是将市民社会界定为调控和引导社会经济关系和需要体系的社会组织。葛兰西坚信,以经济关系来维系的市

民社会,无非也是外在的联合,只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引导,方才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他尝试建立的市民社会,就是要通过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以领导整个社会。这无疑是在寻求一种普遍性,一种与特殊性互相渗透并在其中获得“现实性”的具体普遍性。

除了受黑格尔影响之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葛兰西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市民社会理论上与马克思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全部历史的基础,实现了思辨的哲学向现实生活世界的跃进,开辟了把生产关系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明确路向。同样,作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葛兰西,呼唤并一力于建构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激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推动无产阶级为自由而斗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在西欧所经历的曲折发展,及其所面临的艰难处境,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葛兰西所作的努力,认为在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只有在葛兰西身上才真正“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革命统一”^[12]。这是一个切中肯綮的评价。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是工业的发展,因为市民社会是随着工业发展而兴起的。正是工业制造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将成为否定私有制自身的物质力量,最终扬弃私有制而达到人类解放。20世纪以后,随着人类生活境遇的改变,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变化,诸如卢卡奇、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着重突出阶级意识,法兰克福学派则主要致力于工业社会的批判。应该说,这些关注人类现实生活过程实际变迁的理论研究,与马克思开辟的理论路向相契合,毋宁说是对马克思相关思考的推进。

在现代性成为当代生活的恒常现实的情势下,葛兰西和马克思一样,他们对于市民社会的思考和探讨,不约而同地具有批判和诊治现代性弊端的意义。马克思深入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通过批判资本的“抽象统治”而揭露现代性的实质。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马克思更多地关注市民社会在物质经济方面的寓意。与马克思不同,葛兰西以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为基点而批判现代性,更加强调或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用市民社会理论来承载意识形态的批判。正因为忽视或缺失经济向度的分析或论证,葛兰西

的市民社会理论饱受诟病,甚至遭遇到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质疑。

的确,在如何理解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葛兰西与马克思的差别是不可否认的。就此说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葛兰西所受到的批判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出于强调和重视当代社会生活中上层建筑的意义和作用,葛兰西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解,确实存在着弱化经济因素的理论倾向。当然,学术界并没有恣意否认葛兰西的理论贡献。而且,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了世界历史性影响,至今仍余勇可贾,葛兰西公认是这一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或精神领袖之一。这无疑折射出葛兰西思想的积极意义。正是这样,我们应当充分肯认葛兰西基于当代生活现实而对于市民社会的独创性阐发。

这种独创性阐发,首先来自于葛兰西对阶级意识的强调。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日趋薄弱。在现实生活世界,人们在经济关系束缚与政治强力统治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如此复杂且十分不利的情势,让葛兰西颇为不安。他深感依据黑格尔、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出发的传统解释定向,已难以有效地建构并掌握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反而恰是这种经济关系紧紧将无产阶级的手脚捆绑住,逐步蚕食他们原本强烈的革命意志,从而不能彰显市民社会本来的革命意蕴。在经济关系一时无法得以改观的情势下,唤起革命意志,无疑是重启无产阶级革命的迫切之举。依葛兰西之见,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要想赢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无产阶级的觉醒和积极参与无疑具有本质的重要性。从生活世界的实际出发,无产阶级要能担当这样的使命,当务之急是进行新的精神武装。一旦无产阶级真正成为市民社会的领导力量,现有的强力统治将丧失其存在根基,社会权力将溶于市民社会的各种自我管理机制当中,一个自觉自愿、共同管理的社会状态就成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感觉得到的现实。就此可知,葛兰西的思想独创性并不是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凭空产生的,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市民社会理论正是葛兰西介入生活世界的利剑。

基于重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志,葛兰西还为市民社会注入了文化学的内涵,以增加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成色。诚然,葛兰西对上层建筑的巨大作用抱以殷切希望,但却没有斩断经济基础的根基,而关键在于将文化概念应用到市民社会理论。

葛兰西第一次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内容或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拓宽了人们的认识视野,弥补了过去只是从商业和工业等经济关系角度理解市民社会的不足。对上层建筑进行一番拆分后,葛兰西乐观预见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浪潮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积极作为。在葛兰西看来,若将文化仅理解为知识的堆砌未免过于肤浅,因为其中孕育着新世界观来临的征象,以及创造性自我意识的获得。这里葛兰西为我们给出一个重要提示:诉诸文化学,深入文化背景深处,才能窥探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全貌,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图景并非由单纯的经济—政治学说构成,而应来自于一种综合的文化革命理论。尽管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伦理精神功能奉若圭臬,尽管对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论断深表认同,但葛兰西却有独辟蹊径的指认:市民社会既非“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也不再成为工商业生活的物质关系总和,而是“国家统治的道德内容”,是精神和智力这种意识形态—文化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理论在葛兰西这里发生的转轨,使我们看到特殊时势所造就的理论之思,实际上也反映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人本主义流派思考问题的整体基调。

重视阶级意志和文化领域的行动,这就折射出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底色。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的阐发,实证主义抑或机械论的做法,都让葛兰西大失所望,关键是他们都未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精髓。葛兰西倡导“实践哲学”,意在重启一种“绝对的创造性活动”的新哲学观,以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物质一元论”与唯心主义“精神一元论”的

哲学观,这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葛兰西是从“实践”出发,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意大利的革命现实,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阶级意志在革命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

葛兰西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将理论的批判与现实的革命相对接,为市民社会理论树起一座“卢索尔方尖碑”,也为当下的市民社会研究打开崭新视野。尽管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存在诸多差异,但葛兰西的理论倾向起因于时代本身的复杂性。倘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拉开全部历史之真正“舞台”的话,那么,葛兰西重在申张意识形态革命意蕴的市民社会理论,则使这个舞台绽放嘉惠后世的文化效应。

注释

[1][2][3][4][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第1页,第7页,第220页,第218页。

[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6页。

[7][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8]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9]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10][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4页,第197页。

[12][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责任编辑:曾逸文〕

A Revelation of R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 of Ideology: on Gramsci's Civil Society Theory

Lu Deyou

Abstract: The spe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situations caused different styles of Gramsci's civil society theory. Gramsci's civil society theory occupied a particular place in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since it up-lifted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will and broke the classics of civil society. that Gramsci initiated created a research paradigm with cultural implications for civil society theory, establishing a clear landmark.

Keywords: Gramsci; civil society; ideology; cultural hegemony